

欧阳文彬文集

·
散文卷
·



欧阳文彬 著

我一生爱好写作。由于才疏学浅，没有写出什么值得留下的文字。但我生当伟大的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地下斗争和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以及『文革』浩劫，活到了改革开放的盛世。我的各类作品，多少带有各个特定时期的印痕，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坎坷道路和心路历程。因此，在朋友们热情鼓励和鼎力协助下，编成了这部文集。



上海三联



欧阳文彬文集

· 散文卷 ·

欧阳文彬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摄于 20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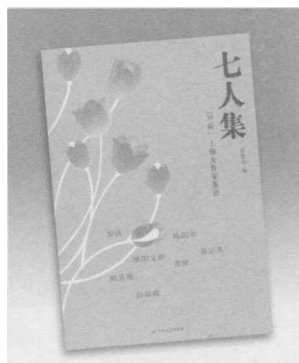


▲ 200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七人集——

“30” 前上海女作家絮语》作者合影

后排左起：彭新琪、姚芳藻、黄屏

前排左起：欧阳文彬、黄宗英、欧阳翠、罗洪



▲ 2010年作者在新华社区
艺术团京剧专场演出中清
唱京剧选段《武家坡》

目 录

怀 人 篇

我三次见到徐特立	3
牛头洲上张天翼	8
想起他未完成的长篇	
——追忆天翼师	14
张天翼与契萌的一段情缘	24
我所了解的叶圣陶	30
编辑大家叶圣陶	55
叶圣陶与“开明风”	69
丁玲给叶老送蛋糕	73
海棠花下的聚会	
——追记叶圣陶先生和老友聚会	77
艺苑因缘	
——记叶老与林熙的友谊	80
怀念叶老	84
忆叶至善	88

他这一辈子

- 忆叶至诚 92

朗月照长风

- 夏丐尊的足迹 99

白马湖畔的寻觅

- 《夏丐尊文集》编辑手记 119

- 李叔同与夏丐尊轶事 126

- 夏丐尊先生与《爱的教育》 129

- 作家的知音徐调孚 131

广告中的学问

- 忆徐调孚 137

- 一切为读者着想的傅彬然 141

- “烟斗”宋云彬 146

- 赵景深与《罗亭》及其他 149

从第一封编辑来信说起

- 记楼适夷 156

- 哭徐雪寒大哥 159

- 聂绀弩印象 162

- 从集中营来到山城的冯雪峰 164

闻名不如见面

- 记胡风 172

- 邵荃麟、葛琴夫妇在桂林 175

- 教戴爱莲讲国语 178

- 与高士其为邻的日子 181

- 追思良师益友彭慧 185

- 记老翻译家董秋斯 195

夏衍、姚溱与河南路 308 号	202
在两次运动中	
——追念夏衍	207
夏衍的学习诀窍	211
夏衍与《新民晚报》	214
彭柏山部长上任以后	217
我与赵超构	220
附录:赵超构“反右”脱险记	姚芳藻 226
赵超构与摄影	231
赵超构拒绝立传	234
姚苏凤其人其事	237
姚苏凤和《红雨》	246
难忘冰心一面缘	249
听钱锺书一席谈	253
我与韦君宜	256
范泉的最后十五年	260
怀念一位不知名的编辑	264
朋友——“敌人”——朋友	
——记戴厚英	266
千里“飞”缘	
——钟耀群与端木蕻良	274
港岛重晤程乃珊	279
她还在迎浪弋行	
——读《雁南飞——黄宗英传》有感	283
我也要“谢谢老谢”	286
一个也不放过	289

木斧印象	293
和新时期作家一起成长	
——记文学评论家戴翊	296
为音乐的一生	
——怀念妹妹陈岚	300

记 事 篇

她是我的“爸爸”	307
童年旧梦	314
在抗战救亡的洪流中锻炼成长	317
火海余生	321
一则招考启事把我引进了新知	325
书店工作放谈	327
三种“退兵仗”	332
亚美图书社始末	334
我的书桌	343
难忘那一方净土	346
《中学生》忆旧	350
想起了读书会	357
虹口三日记	359
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出版活动	366
剪裁一片朝霞	374
译协缘来	377
“小树繁花阁笔记”事件	380
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383
文化干校琐记	387

六十岁学吹打

——从评论转向创作	392
古稀之年学电脑	396
七十年沧桑话三联	399
投笔学艺八十后	402
附录：八十四岁学京剧	蒋丽萍 404
人过六十也精彩	407
与气功结缘	415
我的“绝活”	418
我家有个小贝贝	421
我的长寿秘诀	
——九十抒怀	424

旅 游 篇

登山路上	429
龙华古塔的青春	436
重访龙华塔	441
洞庭访茶	446
蛙情	449
险滩风光	452
天心阁之忆	456
古城访“走狮”	459
人妖种种	
——泰国掠影之一	462
导游阿龙	
——泰国掠影之二	471

泰女窈窕

- 泰国掠影之三 479

留恋榴莲

- 泰国掠影之四 483

- 香港假日 487

- 澳门人 491

- 附录:欧阳文彬的散文特色 孙琴安 494

金沙与篝灯

- 读欧阳文彬的《文苑梦忆》 戴 翊 497

- 后记 499

怀 人 篇

我三次见到徐特立

岁月沧桑，白驹过隙。有多少往事，多少人物，随着时间推移，在记忆的屏幕中远去。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曾经三次见到徐特立。他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高级干部，那可敬可亲的共产党人形象，像雕刻般印在我的脑中，至今无法淡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粉碎了青年学子读书救国的梦想。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那一年，才十七岁的我，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接着考取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正准备升学深造。可是，侵华日军的战火，迅速蔓延到江浙两省，南京、苏州一带频频告急，许多老百姓为了避难，不得不向内地流亡。我和妹妹随着母亲也流亡到长沙。东吴大学却从苏州迁去了高淳，我自然无法前往。

日寇长驱直入，国土一天天沦丧。我和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一样，空怀满腔热血，却不知洒向何方。初到长沙，我插班进了群治农商学院，读了不到两个月，学校被炸，只得停课。不久，北平的民国学院迁来长沙，就地招生，又给了我一次读书的机会，但我心中的迷茫和苦闷依然没有摆脱。那时候的长沙，聚集

着许多流亡而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如翦伯赞、张天翼、吕振羽、谭丕模、陈新(陈世德)等,都在民国学院任教。他们讲课的内容,结合社会现实,传授了许多进步的思想与理论知识。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文艺习作的张天翼老师。他教导我,到生活中去学习,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他还教导我,要学习理论,认清形势,明白事理,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品。又说民族危亡关头,抗敌是第一要务,我们要用笔为抗战出力。他一直鼓励我,不要放下手中的笔。张天翼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恩师。

那时,长沙经常有知名人士公开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吸引了许多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其中,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徐特立老人的演讲。当时,徐老是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又是共产党的驻湘代表。对于他,我早有耳闻,知道他早年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便怀着一种崇敬的好奇心,去听他的演讲。那天我早早来到会场,占了前排座位。不一会儿,听讲的人便潮水般地拥入,连会堂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很快,徐老来了,他径直走上讲台,开始演讲。眼前的徐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竟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他六十岁左右的年纪,两眼炯炯有神,精神饱满,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胸前佩戴着第十八集团军的白布标记,军帽上缀着一颗五角红星,扎着绑腿,穿着草鞋,帽檐下露出的头发是雪白的,操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演讲的主题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讲话的声音洪亮舒缓,富有磁性。话语中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又有军人的威严。他把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阐述得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十分详尽,充满说服力和鼓动性,使我感觉到,十大纲领若能实现,抗战必定胜利,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徐老的演讲,对我这样一个流

亡青年来说,好像黑夜里见到一盏明灯,找到了一条出路,引导着我奔向光明。他最后强调说:“要一切以抗战的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要有抗战胜利的信心。”他还带头高呼口号:“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台下群情激昂,热血沸腾,跟着他振臂高呼,全场燃起一片抗日的怒火,显示出坚定的胜利信念。演讲结束时,徐老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答的,可以随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来找我。”这句话送到了我的心里,我真的很想去找找他,把我苦思冥想,总想不明白的问题,请他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但我还是个未谙世事的女学生,怎敢冒然闯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找一位共产党代表人物呢?!

晚上回家后,我把第一次见到徐老,听他演讲的情景,以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徐特立曾在她读书的周南女中教过书,还是她的老师呢!母亲答应带我去见徐特立。一天早上,我随母亲去了八路军办事处,进门一看,屋里已经排起了长队,等着见徐老的人还真不少。我与母亲也排起队来,到了快吃午饭的时间,还没轮到我们,母亲便对我说:“今天时间晚了,我们走吧,下次再来”,说着拉起我就朝门外走,不料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对我们微笑着说:“请不必急着走,徐老每次都要接待完最后一位排队者,否则他是不会吃午饭的。”听他这样一说,我们就继续等待。大约到下午一点钟左右,终于轮到我们的了。我随母亲走到徐老面前,母亲叫了一声“徐老师”,徐老端详着母亲,停了片刻,说:“你是周南女中的欧阳吧!”母亲惊喜地说:“你还认识我?”徐老说:“认识,姓欧阳的人少嘛。”他接着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按捺不住,赶紧说:“我听了你的演讲,很受启发,但我一个女学生,能为抗战做些什么呢?”徐老语重心长地

说：“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你有觉悟，是要求进步的青年，这很好。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嘛。首先要认真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还要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现在长沙有不少抗日团体，像文化界的‘抗敌后援会’，还有各种抗日宣传队等等，你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宣传抗战、鼓动民众，让更多人明白抗日救亡的道理。这不很好吗！”听了徐老的话，我心里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徐老。

当时生活、新知、读书三家进步书店出版了不少革命理论读物，在青年读者中广泛流传。我按照徐老的指示，认真阅读这些书，进一步认识到正义战争必胜的道理，明白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民国学院教世界语的陈新老师，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带领我参加了长沙世界语者协会、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一致剧社，跟着大伙儿一起编写壁报，上街下乡，演讲、歌咏、演剧，宣传抗日救亡。一次，我们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演到卖艺老汉鞭打自己的女儿时，按照剧情需要，应该是由扮作观众的演员冲上去抢夺老汉手中的鞭子，不料戏演到这里，竟有一名观众抢在演员前面，冲上去夺老汉的鞭子，使人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大家情绪激动，融成一片。最难忘的，是去简陋的伤兵医院，慰问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的情景。我看到那些伤病员，都像我一样的年轻，却一个个缺胳膊少腿，惨不忍睹，更激起我对日寇的仇恨。当我跟大伙齐声合唱：“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受了这荣誉的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唱着唱着，我情不自禁地泪水盈眶。参加了这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我的心灵为之震撼，思想上受到了抗日烽火的洗礼。

1938年6月3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新成为我入党后的第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同年夏天,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我意外地第三次见到了徐老。他居然一下子认出了我,走过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小欧阳啊,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抗日热潮中处处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徐老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环境再险恶再艰难,我始终记住了徐老的这番话。

1938年秋,长沙的形势日益吃紧,机关团体纷纷内迁,民国学院也不得不向湘西撤退,我决定不再上学,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抗战的洪流。1939年,按照党的安排,我转入出版系统,传播进步文化,散布革命的火种。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同时坚持业余写作,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幸运地活到改革开放的盛世,又迎来党的九十华诞。欣喜之余,回首往事,徐特立老人在任何艰苦环境中,所表现的乐观开朗、百折不回的信念,联系群众、诲人不倦的作风,时时激励着我。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写于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之际